

盛唐邊塞詩評

漆鑑軒



02 11/17

前 言

在谈盛唐的边塞诗的时候，有几个问题是需要先加以说明的。

首先是关于边塞诗的概念和范围问题。在中国文学史上，诗的分类基本上有三种方法。一是从形式着眼分类，除四言为主的《诗》体和楚歌式的《骚》体外，有古体、近体之分；古体、近体又各可分为几类，这里不多说。二是按作品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的特征分类，如白居易把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感伤诗、杂律诗四类，前三类就是按诗所表现的思想情感的特征分的，第四类则是着眼于形式。三是按题材分类。这种分类方法起源很早，南朝梁昭明太子萧统编《文选》，分诗为二十类，分类标准并不统一，其中“咏史”、“游仙”、“行旅”、“军戎”等类，基本上是从题材特点着眼的。唐以后人编前代诗集，也有按题材分类的。如宋人编《分门集注杜工部诗》，分杜甫诗为“雨雪”、“山岳”、“园林”、“时事”、“边塞”、“军旅”等七十二门，大多是按题材划分的。我们所说的“边塞诗”，也是从题材着眼的。“边塞诗”，顾名思义，是关于边塞生活内容的诗，诸如表现边地的戍守，行军、战斗，以及有关边

地军中的生活、将士的情怀，边地人民的生活习俗和边地风物等的作品，都应该说是边塞诗。但我们所讲的边塞诗，实际范围并不限于直接表现边塞生活的诗，有一些诗并不直接反映塞上生活，但反映了与塞上生活密切相关的生活内容，这些诗，广义地说，也可以说是边塞诗。如唐诗中有许多送人赴边塞的作品，并没写塞上的所见所闻，但往往也涉及到了边塞戍戎及封侯立功等事，这些作品，我们都是作为边塞诗来谈的。唐诗中还有不少闺怨诗，大多写闺中妇女思念远戍边城的亲人的悲怨，其中虽然往往没有直接写到边塞生活，但与边塞生活密切相关，我们也是把这些作品作为边塞诗来谈的。

关于“边塞诗派”的问题，应该指出，至少在盛唐诗人，是没有诗派的自觉观念的。所谓流派，是指在共同的自觉的文学主张指导下进行创作的作家群。盛唐诗人辈出，一些诗人的诗歌在题材，思想倾向以及艺术风格等方面确有共同性，却不存在这样的自觉的结合。在艺术实践上，中唐的白居易、元稹、李绅等确有在共同的文学主张下结合的方向，他们虽然没有像后来的桐城派那样自觉地以宗派相标榜，但也可以算是中国诗史上比较早的比较自觉的流派了。在中国诗论史上，最早研究诗歌流派问题的，应该是晚唐的张为。张为的《诗人主客图》把中、晚唐诗人分为“广大教化”、“高古奥逸”、“清奇雅正”、“清奇僻古”、“瑰奇美丽”、“博解宏拔”等群，每群有“主”有“客”，“客”则有“入室”、“升堂”、“及门”之分。张为虽然没有提出明确的流派的概念，但他实际上是在研究中、晚唐诗人的流派；有“主”有“客”的一个诗人群，实际上就是一个流派。不管张为对中、晚唐诗歌流派的划分是否科学，是否准确，《诗人主客图》对后代的流派论都是很有影响的。清代文学

家、文学理论家李调元论《诗人主客图》说：“宋人诗派之说，实本于此。”（《诗人主客图叙》）可见《诗人主客图》的影响之大。宋以后，文学流派的概念才逐渐成熟，在实践上才逐渐自觉起来。因此，所谓“盛唐边塞诗派”，是一个后人加于前人的结论，并不是说，在盛唐时，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等就自觉地结成了一个“边塞诗派”了。当然，也不是说在盛唐根本就不存在这样一个“边塞诗派”。文学流派问题在理论上虽然成熟较晚，但文学流派作为文学发展的必然产物，事实上在理论认识成熟之前早就存在了。在中国文学史上，实际上的文学流派产生于魏晋以后，到盛唐，流派这个文学现象就更为明显了。在盛唐时期，边塞诗特别繁荣，诗人几乎无例外地都创作边塞诗，边塞诗并非为一部分诗人所特有。而在盛唐众多的诗人中，确实有一些诗人，在边塞诗的创作上特别有成就。这些诗人的边塞诗，不仅题材相同，而且大多共同体现着盛唐时代的精神风貌，尽管他们的个人风格是同中有异。因此，“盛唐边塞诗派”这一提法，是反映了盛唐诗坛的客观实际的，应该说是科学的。

盛唐边塞诗派，以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为主，还有王翰、王之涣、崔颢、常建、张谓、刘湾等。应该指出的是，这些诗人的诗歌创作成就并不限于边塞诗，这一点，我们在书中一再作了说明，这里不多谈。基于这一原因，我们在着重介绍这些诗人的边塞诗的同时，也简略地对他们的诗歌创作的其他方面作了必要的介绍。

盛唐边塞诗，有其前代的历史渊源，对后来的诗歌创作也有影响。我们在书中追溯了盛唐以前的源远流长的边塞诗传统，对作为盛唐边塞诗的余波的中、晚唐边塞诗，也作了介绍，这里不赘述。至于盛唐的边塞诗对唐以后诗歌（也包括词、曲）的影

响，则主要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思想上的影响。我国古代诗歌从来就有爱国思想的传统，对爱国思想的最充分的发扬，则表现在盛唐的边塞诗中。盛唐边塞诗中的强烈的爱国精神，对后代的爱国诗歌有较大的影响，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这种影响就尤其明显。例如，在南宋陆游、辛弃疾等人的诗词中，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盛唐边塞诗中的那种捐躯赴难，杀敌报国的昂扬气度和激于强烈的报国心的悲愤之情。“大散关头北望秦，自期谈笑扫胡尘”（陆游《追忆征西幕中旧事》），“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觮，汉箭朝飞金仆姑”（辛弃疾《鹧鸪天·有客慨然谈功名因追念少年时事戏作》），这豪壮激烈的情怀，不是多少再现了盛唐边塞诗中的爱国雄风吗？此外，从明末陈子龙、张煌言，鸦片战争时期魏源、张维屏、黄燮清等人的爱国诗歌，我们还可以看到盛唐边塞诗中的壮愤之情。再方面，盛唐边塞诗的雄浑豪健的阳刚之美，我们在后代诗歌特别是爱国诗歌中还常常能看到。陆游作诗之追求“宏大”之境（《示子遹》），辛弃疾词之“大声鞺鞳，小声铿錡，横绝六合，扫空万古”（刘克庄《辛稼轩集序》），与盛唐边塞诗的阳刚之美都有一定的承继关系。他们的创作达到阳刚之美的途径，与盛唐边塞诗人也有类似之处。陆游谈自己诗风的转变时，说自己是在“四十从戎驻南镇”，有了丰富的军中生活体验之后，才领略到了“诗家三昧”的。（《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陆游爱国诗篇中的“宏大”诗风，即与他的戎旅生活有关。这与盛唐崔颢的“一窥塞垣，说尽戎旅”，诗歌得以“风骨凛然”（唐殷璠《河岳英灵集》），正是同一的道路。这虽然不能说明陆游是受到了盛唐某一诗人的创作道路的启发，但至少可以说明，陆游等人的“宏大”诗风，与盛唐边塞诗的阳刚之美确

实是相通的。

在这本小册子的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谭优学先生的《唐诗人行年考》、傅璇琮先生的《唐代诗人丛考》、刘开扬先生的《高适诗集编年笺注》、周勋初先生的《高适年谱》、陈铁民、侯忠义先生的《岑参集校注》，谨向各作者致谢。本书的不足之处和缺点、错误，希望读者同志们指出。

漆绪邦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盛唐边塞诗勃兴的历史原因.....	(1)
第一节 盛唐的边塞战戍形势.....	(1)
第二节 源远流长的边塞诗传统.....	(14)
第三节 盛唐气象和盛唐的边塞诗派.....	(28)
第二章 高适.....	(35)
第一节 高适的生平和创作.....	(35)
第二节 《燕歌行》——盛唐边塞诗的 杰出代表.....	(50)
第三节 高适的其他边塞诗.....	(60)
第三章 岑参.....	(80)
第一节 岑参的生平和创作.....	(80)
第二节 豪迈悲壮的征人情怀.....	(92)
第三节 雄奇瑰丽的边塞景色.....	(104)
第四节 岑参边塞诗的艺术特点.....	(115)
第四章 李颀、王昌龄和盛唐其他边塞诗人.....	(127)
第一节 李颀.....	(127)

第二节	王昌龄·····	(143)
第三节	盛唐其他边塞诗人·····	(173)
第五章	盛唐边塞诗的余波——中、晚唐的边	
	塞诗·····	(199)
第一节	中唐前期的边塞诗·····	(199)
第二节	中唐后期的边塞诗·····	(209)
第三节	晚唐的边塞诗·····	(229)

第一章

盛唐边塞诗勃兴 的历史原因

第一节 盛唐的边塞战成形势

盛唐边塞战成的客观实际，是盛唐边塞诗勃兴的现实基础。盛唐边塞诗的丰富多彩的多方面的内容，都是现实生活的直接间接的反映；而边塞诗人们在这些诗中所表露的各种各样的情感，也都是有感于边塞战成的实际生活而发的。要了解盛唐边塞诗，应该首先了解盛唐时期（主要是唐玄宗开元、天宝时期）的边塞战成形势。

我国有史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上，经过西晋十六国和南北朝的大动乱，民族融合的进程向前大大发展了。李唐王朝建立以后，从中央政权政治、军事的构成，到边地居民的构成，都呈现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各民族成分结合的特征。就中央政权说，这个特征是秦、汉政权所不曾有过的。但在唐代，民族融合的过程还远远没有结束，而是在继续中。在大唐帝国的东北、北、西北、西南各方，还存在着若干少数民族政权。这些政权对于唐政权的关系，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依附性，有不同程度的

从属关系；同时又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离异性，有不同程度的敌对关系。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也有着类似的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发展变化，又影响到它们与唐政权之间的关系。在这样的情况下，以唐政权为中心的各民族政权间，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就是战争。这中间，有唐和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有各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而它们之间的战争，又往往引起唐和战争某一方的战争。因此，唐帝国建立之后，从东北到西南的边境、战争频繁，是一个战争的环境。

当唐帝国建立之初，主要的边患是东突厥。高祖武德年间（六一八一六二六），东突厥曾一再大举入侵，一度达到过离唐国都长安不远的幽州（今陕西邠县）。到武德末期，唐王朝已基本消灭了内地各路军阀，国家实现了大一统，使突厥的侵略受到了遏制。太宗贞观初年，突厥内乱，太宗乘机派兵征突厥，获得大胜，漠北（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地区）平定，突厥酋长及人民纷纷来降，太宗都作了妥善安置，各部落人民居住在北部边境一带，酋长大多封官，边地一带蕃汉杂居，但都是唐民。降服东突厥后，唐帝国声威大振，四方各族纷纷来附，贞观四年（六三〇）共尊太宗为“天可汗”。自此以后几十年间，边境基本上安宁无大战。

为了保证丝绸之路的畅通，太宗又出兵征服了西突厥及高昌、龟兹等天山南路诸国，西域平定，商路畅通，保证了中西经济、文化交流的继续顺利进行。降西突厥后，太宗对安国使臣说：“西突厥已降，商旅可行也。”（《新唐书·西域传下》）西域各国人民听说后，都很高兴。

唐太宗所以能安定四方，除了凭藉强大的武力外，还因为他对四方各族实行了基本正确的政策。征东突厥是为了边境的安宁，征西域是为了商路的畅通，此外，在贞观前期，太宗很少为

了满足拓地欲望而发动战争。凡来附的少数民族部落，都在边地妥为安置，不歧视，不迁入内地强行同化，来降的首长也多拜官，有的甚至升任高级的重要军政职务。贞观二十一年（六四七），太宗曾对待臣谈所以能服边外诸国的五点原因，其第五点是：“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资治通鉴·唐纪》十四）除了贞观后期征高丽的错误外，太宗一生对边外各国的政策，当得起他的这个自赞。

高宗时，西北边境及西域地区的局势基本上是稳定的，高宗还设置安西大都护府，辖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四镇（都在今新疆天山以南地区），进一步巩固了对西域的控制。但到高宗后期及武后时期，由于西突厥余部的逐渐复兴及吐蕃（读bō，玻）的强大，也由于朝廷政策的某些失误，边境几十年基本稳定的局面被打破了。这首先表现为唐对西域逐渐失去了控制。一方面，西突厥突骑施部在西域兴起，成为唐在西域的大患；另一方面，吐蕃在这时强大起来，成为对唐西北边境的威胁。吐蕃在太宗时已为强国，但由于实力不足以与唐争锋，与唐的关系以和为主，太宗养女文成公主的入蕃，是两国和好的一个标志。高宗时，吐蕃进一步强大起来，出兵攻西域，夺取了龟兹等四镇，又灭吐谷浑（在今青海），在西域占了优势。武后时，虽收复了四镇，但吐蕃在西域的势力不减，到中宗、睿宗及玄宗时，一直是唐西北边外的大敌。武后时，东北边境的奚、契丹也日渐强大，与唐的关系是时附时叛，东北边境不得安宁。

玄宗即位后，边外各国：东北主要为奚、契丹，北方主要为东突厥，西北主要为吐蕃，西域则有西突厥的突骑施部。朝廷为防御边外各国的入侵，也为了拓边以求武功，设立了一系列拥有重兵的节度使，到天宝初年，主要有以下节度使：

范阳节度使，治所幽州（今北京市）；平卢节度使，治所营州（今辽宁朝阳县）。主管对东北奚、契丹等的防务。

河东节度使，治所太原（今山西太原市）；朔方节度使，治所灵州（今宁夏灵武县西南）。主管对北边东突厥的防务。

河西节度使，治所凉州（今甘肃武威县），陇右节度使，治所鄯州（今青海乐都县）。主管对西北吐蕃的防务。

安西节度使，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县），辖龟兹、焉耆（今新疆焉耆县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县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四镇；北庭节度使，治所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北破城子），统伊州（今新疆哈密县）、西州（今新疆吐鲁番县东南）。主管西域军务。

玄宗时期，边境战事十分频繁。战争的发生，主要有以下几种情况：

一、边外少数民族政权入侵，唐方进行反侵略的自卫战争。开元、天宝年间，吐蕃与唐的战争，许多就是由于吐蕃入侵造成的。如开元二年（七二四）秋，吐蕃十万人入寇临洮（今甘肃岷县）、渭源（今甘肃渭源县）等地，掠取牧马，唐军迎敌，大败吐蕃军；开元二十九年（七四一），吐蕃四十万人入寇陇右，被唐军击败。

二、唐方为收复被占的边陲要地而发动的战争。如开元初年收复被契丹占据的营州而发动的战争，天宝十二年（七五三）为收复被吐蕃占据的九曲故地而发动的战争。（按天宝三年改“年”为“载”，肃宗至德沿用“载”，故史籍于天宝三年以后纪年及至德纪年，皆称“年”为“载”。为统一起见，本书于天宝、至德纪年皆称“年”。）

三、边境地区归附的少数民族酋长举兵叛离，唐方举行的讨伐战争。如开元九年（七二一），兰池州（今宁夏盐池县境）突

厥人康待宾煽诱突厥降户叛，攻陷六胡州（今内蒙、陕西、宁夏交界一带），并纠合七万之众侵扰朔方边地，朝廷命朔方、陇右军讨平。

四、唐方出于拓边政策或由于边将图功利而挑起或发动的战争。这类战争，开元中期以后及天宝年间较多，我们在下面将要详细谈到。

五、边外少数民族政权之间发生战争，某一方求助于唐，因战争危及唐利益，唐出兵支援。如开元十年（七二二），吐蕃围小勃律国（在今克什米尔境内），国王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嵩，对张说，勃律是唐的西门，勃律亡了，西域就是吐蕃的了。张嵩于是派兵援助，与小勃律军合击吐蕃，打了大胜仗。此后吐蕃在一段时间里面不敢再犯西域，保证了西域的安宁和丝绸之路的畅通。

从以上几种情况看，就唐方来说，在多数情况下是保卫疆土的正义战争，但也有对外侵略的不义战争。后一种情况，在开元中期以后及天宝年间出现较为频繁，值得注意。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以后，上承贞观之治的余势，励精图治，生产得到发展，社会比较安定，国力更为强大了。开元前期，朝廷对北边的突厥及西北的吐蕃基本上采取守势，来犯则战，战则能胜，又对东北的奚、契丹及北边的突厥实行羁縻及和亲的政策，边境虽时有战争，但大势比较安定。从开元中期起，朝廷在政治上开始趋于腐败，玄宗除信用奸邪，侈靡无度外，还越来越好大喜功，穷兵黩武的拓边政策逐渐形成；边将为了讨好玄宗并谋取私利，也往往故意挑起或发动边境战争。开元十五年（七二七）初，凉州都督王君奭主动对吐蕃用兵，在青海获得大胜。在这之前，宰相张说曾对玄宗建议对吐蕃实行和平政策，他说：

“连兵十余年，甘、凉、河、鄯不胜其敝，师虽屡捷，所得不偿所亡，闻其悔过求和，愿听其款服，以纾边人。”在开元十五年之前，吐蕃虽一再扰边，同时也曾于开元二年、四年、六年、七年一再求和，希望与唐确立甥舅之亲。这在吐蕃，虽是出于内部困难，并无永久和平的诚意，但如允其求和，并实行加强防务的妥善政策，保持一个时期的和平还是有可能的。但除四年的一次外，都遭到玄宗拒绝。张说的建议，是看到边境连年用兵，民生凋敝，得不偿失的情况，希望安定边境，减轻人民负担而提出来的。但玄宗被多次的胜利冲昏了头脑，没有采纳张说的建议，反而听从王君奭“深入讨之”的主意，同意他用兵青海。战事胜利以后，王君奭“以功迁左羽林大将军”，玄宗从此“益事边功”。（以上见《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

开元后期，特别是天宝年间，唐屡次对东北的奚、契丹、西北的吐蕃用兵，不惜劳师费饷，不恤士兵的痛苦和牺牲，朝廷拓边的欲望越来越膨胀。唐对吐蕃石堡城的用兵，就是最典型的一例。石堡城又名铁仞城（在今青海西宁市西南），处唐与吐蕃边境，玄宗前为吐蕃所据有。开元十七年（七二九），朔方节度使信安王李祎发兵深入青海，取石堡城，“自是河、陇诸军游弈拓境千余里。上闻大悦，更命石堡城曰振武军。”（《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开元二十九年年底，吐蕃又占石堡城，玄宗耿耿于怀。天宝六年（七四七），玄宗命陇右、河西节度使王忠嗣取石堡城。王忠嗣对玄宗说：“石堡险固，吐蕃举国守之，若顿兵坚城之下，必死者数万，然后事可图也。臣恐所得不如所失。请休兵秣马，观衅而取之，计之上也。”（《旧唐书·王忠嗣传》）王忠嗣是开元、天宝间很难得的一个“以持重安边为务”的将领，他曾对人说：

“国家升平之时，为将者在抚其众而已，吾不欲疲中国之力，以

微功名耳！”（同上）王忠嗣的不同意取石堡城，就是为了反对“疲中国之力”以拓边，应该是有识之见，同时也显然是有针对性的，因此玄宗听了很不高兴，逼迫王忠嗣分兵助董延光取石堡。王忠嗣分兵没有满足董延光的要求，并对李光弼说：“今以数万之众争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敌，不得亦无害于国。”并表示即使丢官罢职，也不支持取石堡：“忠嗣岂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乎！”（《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王忠嗣的话，说明了当时拓边政策的两个特点：一是为得边功而不顾劳民伤财，朝廷一己之私欲完全放在国计民生之上了；二是边将以职位为重，把个人的升迁放在千千万万士兵的生命之上了。没有过多久，王忠嗣被李林甫诬陷下狱，哥舒翰接替王忠嗣任陇右节度使。天宝八年（七四九），哥舒翰承玄宗之命率六万余人（一说十万人）攻石堡城，吐蕃军数百人据险固守，唐军用了几天时间，士兵战死数万，才攻克石堡城。王忠嗣认为此役将“所得不如所失”，完全说对了。哥舒翰因取石堡之“功”得到玄宗的欢心，“上录其功，拜特进、鸿胪员外卿，与一子五品官，赐物千匹、庄宅各一所，加御史大夫。”（《旧唐书·哥舒翰传》）王忠嗣所谓“疲中国之力以微功名”，“以数万人之命易一官”，也说对了。哥舒翰取石堡城之后，虽得到朝廷的嘉奖，却在士民中引起了极大的愤慨。李白《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君不能学哥舒，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屠石堡取紫袍！”谴责哥舒翰穷兵黩武，以数万人的生命和鲜血换取高官厚禄，代表着一般有识之士的看法。当然，真正穷兵黩武的祸首，是李隆基，哥舒翰之流，不过是执行祸国殃民的拓边政策的走卒而已。

朝廷的拓边欲望无限膨胀，也鼓舞了一些贪功求利的边将，他们一要讨好朝廷，二要升官发财，而达到这两个目的的最方便

的办法，就是战争；在开元后期以至天宝年间，战争简直成了一些边将的生财求名之道了。唐立国之后，对于边庭将帅的任用在一段时间里是很谨慎的。一方面，“边帅皆用忠厚名臣”（《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他们有远见，有谋略，严于律己，又知道什么是国计民生，故能取持重安边的上策。如开元名相张说，开元七年至十年先后任并州大都督府长史、天兵军大使及朔方军节度使，实行的是太宗“降则抚之，叛则讨之”的遗训，以其忠勇胆识安边，求得了北部边境的和平。他不但以穷兵黷武为事，反而裁减士兵二十余万，使其回家务农。另一方面，对于边地大将，都不使久任，并“皆以大臣为使以制之”，防其跋扈。（《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开元中期以后，“天子有吞四夷之志”（同上），边将兵权极大，任期极长，而其在政治、品行、才略、文化等方面的素质，已大不如中期以前。天宝初年，李林甫专权，鉴于过去名臣往往以节度使入相，为把持相位，“志欲杜出将入相之源”，于是对玄宗建议：“文士为将，怯当矢石，不如用寒族、蕃人。蕃人善战有勇，寒族即无党援。”此后，高仙芝、哥舒翰等皆任大将，“林甫利其不识文字，无入相由”（《旧唐书·李林甫传》）。这样一来，一些目不识丁，“勇而无谋”、利欲熏心的人担起了边将重任，甚至安禄山那样的野心家，也因为“寒族、蕃人”而被重用。要他们为国为民，有远见卓识，有安边才略，求得边境和平，那是难上加难了。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边将，安边无能，乱边倒很有本事。开元十八年（七三〇），皇甫惟明对玄宗论边将利于边境有事：“夫边境有事，则将吏得以因缘盗匿官物，妄述功状以取勋爵。此皆奸臣之利，非国家之利也。”（《资治通鉴·唐纪》二十九）揭露得多么透彻！

开元后期以至天宝年间，边将图勋爵财利而挑起边塞战争的事，所在多有。如河西节度使崔希逸曾对吐蕃边将说：“两国通好，今为一家，何必更置兵守捉，妨人耕牧，请皆罢之。”吐蕃边将听信他的话，与他“刑白狗为盟”，撤去了守备。开元二十五年（七三七），崔希逸的部下孙海入朝奏事，“自欲求功”，对玄宗说吐蕃无备，进攻可获大胜。玄宗派大臣去前线视察，大臣以玄宗名义命崔希逸出兵，果然打了大胜仗。孙海因此得了“厚赏”，而“自是吐蕃复绝朝贡”，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了。（《资治通鉴·唐纪》）三十）这是边将贪功求利，背信弃义，破坏边境和平的典型的一例。开元二十六年（七三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部将白真陀罗等出兵伐奚，并实行“践其禾稼”的野蛮手段，结果打了败仗，张守珪竟“隐其败状，而妄奏克获之功”。（《旧唐书·张守珪传》）天宝九年（七五〇），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伪与石国约和，引兵袭之，虏其王及部众以归，悉杀其老弱。仙芝性贪，掠得瑟瑟十余斛，黄金五六橐驼，其余口马杂货称是，皆入其家。”第二年，高仙芝入朝献俘，朝廷竟不清红皂白，加封高仙芝为开府仪同三司。（《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二）后来，西域诸国引来大食军队攻安西，即由此引起。天宝间，安禄山“欲以边功市宠，数掠奚、契丹。”（《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类似的事例甚多，不具举。仅此几例，已可说明盛唐时期许多边塞战争的性质了。

由于朝廷的穷兵黩武政策，战争频仍，开元、天宝之际，军费激增，给人民带来沉重负担。据《资治通鉴·唐纪》三十一：“开元之前，每岁供边兵衣粮费不过二百万。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公私劳费，民始困苦矣。”人民的沉重负担，当然并不始于天宝年间，开元十